



陈其泰: 历史评价理论所经受的考验和历史主义原则的阐扬

热

陈其泰: 历史评价理论所经受的考验和历史主义原则的阐扬

[作者: 陈其泰 转贴自: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第二章第五节(二), 中国经济史论坛转载 点击数: 95 文章录入: tadmin]

(一) 学术的争鸣和论争推进了理论的发展

由于中国史学在20世纪50年代末面临的特殊形势, 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学者所持的历史评价理论的发展, 特殊的形势又是对这一理论体系的严峻考验, 使正确的观点迸发出光彩, 显示了唯物史观的真理性认识所具有的力量。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处的环境, 一方面是正常的学术争鸣的积极推动。在1950年代初, 尽管有批判胡适、批判电影《武训传》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事件, 但是从总体上来说, 学术界所营造的氛围是健康、积极的, 允许自由讨论问题, 可以指名道姓批评别人, 尊重被批评者答辩的权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虽然在1956年才正式提出来, 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本人在1953年即已形成在学术界应当提倡民主讨论问题的指导思想。据刘大年回忆, 1953年“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开会, 讨论中国科学院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出版历史刊物等事项, 即考虑到郭沫若、范文澜在古史分期上看法不同, 应开会自由讨论, 增加研究机构的目的是“把历史研究的阵营搞起来”, 以有利于讨论学术问题。历史研究百家争鸣, 实际上是党中央主席毛泽东的意见。范文澜在这次会议上即主动提出可以把《中国通史简编》作为大家讨论的底稿。[1]1956年党中央正式提出“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 进一步促使史学工作者对学术问题进行讨论、各抒己见。在此前后, 《历史研究》杂志创刊, 及其后发表陈寅恪的考证文章《论韩愈》、《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 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顾颉刚的《秦汉方士与儒生》、刘节的《古史考存》、唐长孺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戴焯煊《宋代钞盐制度研究》等考证性著作, 都是有意提倡学术上不同风格的兼容发展和不同观点的争鸣。这种民主讨论问题、不同意见展开争鸣局面的继续和发展, 是1959年因郭沫若的文章

《替曹操翻案》引起的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大讨论, 由评价曹操又引起对其他历史人物和历史问题的热烈讨论, 形成了空前未有的活跃局面, 大大促进了史学研究工作, 已如前述。这种正常的学术讨论和争鸣当然对于历史评价理论的提升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然而史学前进的道路又是曲折的。除了正常的学术争鸣以外, 1950年代末因政治因素的影响而出现的特殊局面, 又使学术界面临严峻的考验。1958年以后由于“大跃进”时期左倾政治路线的影响, 有人提出“史界革命”的口号, 在高等学校中把一些学有专长的教授称作是资产阶级专家进行批判。“拔白旗”, 学生上讲台, 学生编讲义, 用二三月时间即“编成”一本通史讲义或断代史讲义, 只能是剪刀加浆糊, 用几条干巴巴的材料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公式的注脚。“以论带史”的口号在史学界中流行, 实则变成了“以论代史”, 讲课或写文章变成了社会发展史概念的演绎。重视史料的学者被作为“唯史料论”、“资产阶级方向”来批判, 更无人敢去认真搜集、分析、考证史料。对唯物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根本不加消化, 不问其是否适合于中国历史的实际, 就当作标签随意套用。片面强调历史上的阶级斗争, 任意拔高对历史上农民起义的评价, 把阶级出身绝对化, 对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理想化”、“现代化”, 许多历史上有杰出成就的思想家、诗人、艺术家则因出身于地主阶级而不予提及, 更不敢提到帝王将相在历史上的作用, 甚至历史上的王朝和帝王纪年也被视为封建的记号而要抹去。

面对“教条化”的泛滥,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头脑是清醒的, 他们勇于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历史研究的正确原则, 挺身而出反对教条化的错误倾向。郭沫若于1959年3月接见《新建设》杂志记者, 就当前史学工作问题发表谈话, 他说: “旧时代的史书, 是帮帝王将相作家谱, 那种编写方法, 无疑是应该抛弃了。我们今天研究历史, 应该打破封建王朝体系, 这是对的。……打破王朝体系, 并不是要求把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抹掉。事实上既存在过朝代, 如何能抹掉呢? 我们要打破的是旧的历史观点、封建正统观点、专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办法”。他又明确指出: “从新的历史观点出发, 固然应该着重写劳动人民的活动, 但以往的社会既是阶级社会, 统治阶级的活动也就不能不写。”[2]范文澜于1961年3月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巴黎公社9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发言, 同样严肃地、及时地提出史学界存在着离开史实、忽视史料、抽象地空谈理论的学风不正的严重问题, 强调踏踏实实进行科学工作的重大意义。他说: “真正打得倒敌人的历史学大炮是经过切切实实研究的历史著作(论文或书籍)。要造出这种大炮, 必须对所研究的历史事件做认真的调查工作, 阅读有关的各种书籍, 系统地从头到尾读下去, 详细了解这件事情的经过始末, 然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方法来分析事情发生的原因和发展过程中发生的好的因素和坏的因素, 判断这件事情的趋向是什么。写文章不是因为手痒了, 嫌纸太多了, 而是要解决某个问题, 所以必须坚持‘有

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的老实态度。切忌临时抓夫式的搜集材料，杂七杂八大堆，好像一篇狗肉帐，使读者摸不着底里。”“懒得作调查工作，把自己杜撰的一些公式和规律，演成篇幅，说这就是论文，或者说这就是著作。这样的大炮放出去，对敌人是丝毫无伤的。”在发言的最后，他提出“把严肃的学风在我国历史学界发扬起来”。[3]紧接着，范文澜在5月举行的纪念太平天国革命11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又严肃地批评了史学界流行的“打破王朝体系论”和“打倒帝王将相论”，强调要透过这些论调貌似“革命”的表象，认识其对史学研究的危害，坚持严格的历史主义。范文澜说，这种论调好像是很革命的，实际上是主观主义的。阶级社会是由互相对立着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构成的，打破王朝体系，抹掉帝王将相，只讲人民群众的活动，结果是一部中国历史就只剩农民战争，整个历史被取消了。范文澜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劳动群众的历史”，这本是真理，但是把它绝对化、片面化，只承认历史上的劳动群众，不承认历史上的帝王将相，这就成了谬论，应当受到大家的反对。[4]

(二) 阐发历史主义的基本原则

1950年代末教条化的严重失误充分说明了一旦历史研究背离了正确原则的指导，走上片面化、公式化对待唯物史观原理和经典作家论述的错误道路，背离科学的历史评价体系，就会导致多么严重的后果！这就从反面刺激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思考，从理论上辩证地分析错误的种种表现及其产生的原因，正面申论评价人物、事件所应坚持的基本观点。这一时期提出的许多论点都是围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这一基本命题展开的，既有鲜明的针对性、论辩性，又有深刻的理论蕴涵，因而大大推进了这一理论体系的构建，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成果。上述郭沫若、范文澜批评教条化错误的论述都贯彻了这一基本命题，与他们观点相通、互相呼应，并成为阐扬历史主义原则的代表人物是翦伯赞。

翦伯赞对于唯物史观的原理及其运用有很深的造诣。翦伯赞早在1938年即著有《历史哲学教程》，论述了“历史发展之合法则性”、“历史的关联性”、“历史的实践性”，“历史的适应性”等问题，在讲到“历史的关联性”时提出：“我们固然不能像观念论者把个人从大众之中分离出来，过分地加以夸张；但同时，我们也不能象机械论者一样，把个人与大众对立，认为历史只是经济力量自然进化的结果，故而不屑于去研究创造历史的许多个人，研究他们的愿望、感觉及其思想……”他又说：“在一切民族的历史过程中，推动历史发展的，不只是客观的动因，而是客观的动因与主观的动因之辩证的发展。”[5]这些论述已经包含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把不同人物放在时代所提供的条件下去评价其作用（包括正面人物的积极作用和反面人物的反动作用）等非常有价值的基本看法，以后他理论的发展即以这些基本看法为基础。至1959年春至1962年春，由于教条化一度盛行对他的刺激，使其深感有责任对离开具体历史条件、随意套用概念的种种错误表现予以廓清。与此同时，他在1961年起负责主编《中国史纲要》，作为当时全国文科教材会议确定的高等学校中国通史教学用书，编写组在当时“左”的倾向严重的时代环境中工作，遇到一系列问题感到无法把握，翦伯赞作为主编，他有责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予以回答，作为编写工作中处理诸多历史问题的准绳。他在这一时期所写的理论文章堪称前呼后应，理论的逻辑性首尾一贯。核心的问题，是依据经典作家论述“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6]的精神，有针对性地联系极左思潮下史学领域中出现的典型现象和错误认识，阐释和发挥必须实事求是、不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看待和评价历史问题、进行科学的具体的分析、尊重历史的辩证法发展等基本原则。由于极左教条化的主张片面强调“阶级观点”，将之绝对化，故翦伯赞特别突出“历史主义”。

翦伯赞在这一时期撰写的最重要的理论文章是：《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1961年12月）和《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1962年6月），其他还有：《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1959年3月）、《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1959年10月）、《关于史与论的结合问题》（1962年2月）等。这些批判左倾思潮、捍卫历史学的科学性的战斗檄文，涉及的内容很广泛，意义重大。就发挥唯物史观的论点、推进历史评价理论体系而言，主要阐发了三个问题：

其一，在理论上对左倾思潮在史学界的种种表现定了性，指明其违背历史研究实事求是原则、违背历史科学根本任务、违背马克思主义根本原理的实质，所以与唯物史观是根本对立的。在左倾思潮影响下，种种错误的、严重损害历史科学事业的做法是打着革命的旗号出现的，来势汹汹，简直势不可挡。翦伯赞却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同郭沫若、范文澜等人一样，挺身而出，历陈错误倾向的多种表现，指明其严重后果。当时流行着“打破王朝体系”的口号。这一口号如果理解为不受历史上封建王朝的更迭的束缚和限制，做到更深入地揭示和叙述历史发展的趋势和实质，那自然有积极的意义。但不少人却完全不是这样理解，而是主张为了打破王朝体系，连王朝的称号和王朝本身的历史也要从中国通史中削减或删去，主张把帝王将相的活动，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以及传统认为十分重要的政治制度、政治沿革都予以删减。翦伯赞明确指出：“如此说来，好像打破王朝体系以后的任务，只是一反前人之所为。过去轻视的，我们现在就重视；过去多讲的，我们现在就少讲或不讲。例如，过去的历史看不见人民群众的活动，我们现在就还他一个看不见帝王将相；过去的历史看不见农民战争，我们现在就还他一个看不见统治阶级的活动；过去的历史看不见经济基础，我们就还他一个看不见政治制度；过去的历史专讲政治沿革，我们就还他一个来历不明；过去的历史专讲王朝始末，我们现在就还他一个一字不提；过去的历史不讲或少讲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我们现在就还他一个不讲各民族统治阶级之间的战争。”对于左倾思潮将会造成的严重后果，翦伯赞当时就严肃地予以定性：这是“走极端，走偏锋”，将给“新的中国通史带来极大的片面性”，“这不是辩证法，不是科学的态度”。[7]

翦伯赞又揭露片面理解“厚今薄古”口号带来的多种错误做法，指出“现在有不少的人把厚今薄古当作分量问题或先后问题”。[8]其表现为，为了“略古详今”，对古代史部分一味从略，连基本知识都不讲，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突然加详，有的是把讲课的顺序颠倒过来，先讲现代史，再讲近代史，最后讲古代史。又在教学中作不恰当的历史类比，如把明代在朝鲜进行的抗击倭寇的战争和解放后的抗美援朝类比，把古代农村公社

与刚刚出现的人民公社类比。在教学中,不提孔子、商鞅、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隋炀帝、林则徐,甚至不提秦王朝、汉王朝、隋王朝。讲世界古代史也不提凯撒、亚历山大的名字。这样的历史,看不见历史人物的活动,看不见古代国家的制度和措施,看不见历史事件发生的各种背景,剩下的便是摘引马列著作上的词句和唯物史观概念的演绎。翦伯赞深刻地分析“史学革命”口号下的所造成的掩盖历史真相、取消生动的人类历史的严重恶果:“不仅帝王将相的活动写的少,就是农民战争的领导人物也写得不多。在有些论农民战争的篇章中,总是用矛盾尖锐化一类的空话来证明农民战争的必然性。发明家的名字几几乎也要从历史上删去,因为在有些同志看来,所谓发明,不过总结劳动人民的经验而已,不应该把发明的功绩写在个人名下。而且在写到个人人物、特别是帝王将相的活动时,也不承认他们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好像他们都‘是被历史必然性的内在规律从神秘的暗室里牵出来的傀儡’。”并进而一针见血指出左倾思潮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实质:“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认为历史可以完全按照人的主观愿望而发展,人的历史活动可以不受任何约束,人想创造什么样的历史就能创造怎么样的历史,这当然是一种荒谬的神话。但是如果把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绝对化,而把人,包括个别历史人物在历史上所起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降低到不应该的程度,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经济决定论。”[9]

其二,针对左倾思潮影响下,把“阶级观点”绝对化的观点,翦伯赞旗帜鲜明地提出“阶级观点应与历史主义相结合”的论题,并且着重论述如何以“历史主义”的尺度来评判各种复杂的历史问题。翦伯赞发表的《对处理各种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等文,就是顶着左倾思潮大肆泛滥而提出的“历史主义论纲”,既深刻地剖析了持极左观点者在方法论上以主观臆断代替客观历史的致命失误,又对正确评价复杂历史问题作出许多精彩的理论概括。

关于如何正确对待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和封建时代的政治、法律、制度、文化等问题。翦伯赞批评随意删去王朝称号的错误做法,指出:“我们要打破的是以王朝为体系的封建正统主义的历史观点,不是王朝的称号。恰恰相反,我们必须从这些王朝的具体的史实出发,并且通过对这些具体的史实的分析、概括,揭示历史的规律性。”并认为:“王朝的称号是时代的符号。一个跟着一个出现的王朝,正是中国历史在其发展进程中的里程碑。”[10]翦伯赞又明确提出:“我们既不要对自己的历史盲目歌颂,美化阶级社会;也不要对自己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把自己的历史写成苍白无色,好像只是一些罪恶的堆积。”[11]他强调必须自觉的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把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结合起来,才能对历史事实作出全面而公平的论断。他评论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一类做法在思想方法上的错误,就在于违背了辩证地历史地分析历史问题的原则:“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来,任何剥削制度、剥削阶级都曾经在它的上升阶段起过进步作用。例如当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时候,它是一种进步的制度;当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阶级的时候,它是一个革命阶级。只有当这些阶级走向没落的时候,当这些制度走向崩溃的时候,才是反动的,该骂的,该反的。如果当这个阶级、这个制度一出现于历史就反对它们,岂不是反对历史的发展。”[12]

关于如何正确对待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领袖问题。翦伯赞认为,必须区分两种情况:农民反对封建压迫、剥削,反对封建地主,反对封建全部;但是,农民不可能意识到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来反对,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把皇权当作一个主义来反对。换言之,“农民所进行的反封建、反地主阶级的斗争是自发的,不是自觉的”“农民建立的政权,只能是封建性的政权。”因此,应肯定农民战争的领袖人物,但是不要把他们理想化,现代化,以致说成和现代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一样。总之,“不要忘记农民战争是发生在封建时代,不要忘记农民是小所有者,也不要忘记农民并不代表新的生产力。应该历史主义地对待农民战争,不要强调农民战争的落后性、盲目性,也不要夸大农民战争的组织性和自觉性”。[13]

关于如何对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翦伯赞总结左倾思潮在论述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的突出表现是:因为今天讲各民族一律平等,就去掩盖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不平等;因为今天讲反对大汉族主义,就去否定汉族在中国历史上的主导作用;因为今天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就否认历史上存在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他高度概括地论述以历史主义态度对待历史上民族主义的基本原则:“各民族一律平等,这是我们对民族问题的原则。离开这个原则,我们就要犯错误。但应用这种原则去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不是用简单方法把不平等的民族关系从历史上删去,或者从那些不平等的关系中挑选一些类似平等的个别史实来证明这个原则在中国古代就已经实现,更不是把历史上的不平等的民族关系说成是平等的。而是要揭露历史上的不平等关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的态度,指出这些不平等的民族关系的历史根源和实质。”“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是民族关系的主流,但不能说在阶级社会的历史时期各族统治阶级之间,就没有矛盾和冲突。要着重写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也要写各族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14]他认为,应当从历史事实出发,尽可能地多论述国内各少数民族在祖国的历史创造中所作出的贡献,“但这不是说就可以否认汉族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主导作用。中国的历史是中国内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不承认这一条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同样,不承认汉族在中国史的创造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例如农田水利的开发,商业联系的加强,逐步把国内各民族联结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汉族出力最多。又如破坏旧的部落的原始性,摧毁落后地区的闭塞性,使落后地区的民族和全国的经济建立了联系,也是汉族出力最多。但是应该指出这种进步过程的推进,不完全由于各族的协作,往往是在汉族或其他统治中国的民族中的统治阶级压迫其他民族的程序上进行的。”[15]

关于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翦伯赞认为,要历史主义地对整个阶级社会时期的人民群众和统治阶级人物。“在写历史的时候,要着重地写人民群众,也要写个别的历史人物,包括帝王将相在内。”要防止和反对把历史上人民大众任意拔高、理想化、现代化的倾向,要如实地承认和反映出他们是在被剥削的情况下参加历史创造,他们反对剥削,但不反对私有制度,因为历史上的人民大众不可能达到现代无产阶级的认识水平。除了肯定以外,“还要指出他们的历史局限性,指出他们在生产中的保守性、分散性和落后性”。同时,要肯定杰出人物的历史功绩。“在我国历史上,每一个时代或每一个王朝,都有一些杰出的历史人物,这些人物或者是革命领袖、民族英雄,或者是政治

家、军事家，或者是科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诗人、艺术家，其中有些是帝王将相。”“要按照他们对历史所起的作用和对历史所作的贡献的大小给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和恰如其分的评价”。[16]

其三，以理论上大无畏的勇气，论述史与论的关系，顶住巨大的压力，态度鲜明地提出“以论带史”的口号应该废除。他尖锐地批评教条化、贴标签的做法，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把经典著作中的言语当作任何问题都可以通用的万应灵药”，“觉得史学论文中引用经典著作中的文句愈多，则它的理论性愈高。这样，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挑选经典著作中的文句，就在于一再重复这些文句”。[17]他进而分析“以论带史”口号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以论代史”，把臆想的结论强加于具体的历史，以致割裂历史，使历史上的客观存在服从历史家主观的意图。他指出，“有些教师，也引用一点材料，但他们不是根据这些材料作出独立的概括，更谈不到创造性地解决历史问题。他们挑选材料只是作为原理原则的注脚，因而研究的全部艺术就在于多多益善地引用经典著作中的词句。经典著作变成了历史科学的标签。”在历史教学和研究中，“只是围绕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原则甚至文句转来转去”，“致使内容丰富多采、具体生动的历史变成了单调、僵死和干燥无味的教条，变成了一片沙漠”。当错误倾向袭来的时候，翦伯赞挺身而出，大声疾呼这些热衷于搞教条化的人是“把经典著作变成了历史科学的标签”，“以论带史”的口号应当废除，这在当时确实具有石破天惊的力量！他提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观点与材料的统一”。针对当时许多人不敢提史料的重要性、怕这样会犯错误的情况，他甘冒风险，无所畏惧地提出：“应该肯定史料是重要的，研究历史没有史料是不行的，史料是弹药，没有弹药专放空炮是打不中敌人的。”并且强调说：“材料是知识的泉源”，要想在研究中做出成绩，就“必须详细占有材料，把握事实的总和”。[18]

围绕历史评价问题，翦伯赞在这一时期所论述的，涉及到如何对待封建王朝和剥削阶级，如何对待农民和起义领袖，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如何对待民族关系，这些，都是认识历史和评价历史的重大问题。在19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翦伯赞的论述以围绕阐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为中心来展开，这就使得他的文章更具有时代的意义。为了分析和纠正教条化倾向的严重错误，为了辨明历史研究的大是大非，为了捍卫历史学的科学性，他在错误潮流来势喧嚣的时刻，与范文澜等人一样，砥柱中流，表现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原则性和理论勇气。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经过了严重挫折，但她经受了这场严峻的考验，并在斗争中获得了发展，尤其是翦伯赞、范文澜等人为了捍卫唯物史观原则而表现的坚定性和创造精神，更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曾与翦伯赞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多年共事的田余庆评价翦伯赞的精神是：“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战斗，在风浪中不失准绳；实事求是，保持理论战士的高尚操守；坚持真理，老而弥笃，无畏无私”。并说：“为了维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为了使北大历史系的教学科研不致于离开马克思主义轨道，伯赞先生甘冒风险，据理建言。”[19]历史已经证明，翦伯赞所坚持的主张是具有高度理论价值的，他抵制极左思潮、捍卫历史学科学性的努力在当时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两文的发表，曾使史学界不少人体会到拨乱反正的力量，启发和鼓励他们以实事求是的原则研究历史。

在此前后，吴晗也相继发表了《历史教材和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有关历史人物评价和历史知识普及的问题》等文章，批评非历史主义倾向，还论及了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关系，主要内容有三点：一、对当时的学风进行了批评。他说：“似乎在历史学界有一种宁左勿右的倾向，右了怕犯错误，左一些问题不大”。这是一种“非科学的，非历史主义的学风。……这个苗头是不对的，我们必须坚决反对”。[20]二、严肃地批评把一部历史归结为农民战争史是非历史主义的。其原因是，“第一，只写农民起义的一面，不写或少写农民所反对的一面，这样一来，阶级斗争几乎只剩下一面了。”[21]“第二，由于特别强调农民起义，势必压缩其他方面的叙述，农民起义史有代替中国通史的趋势。第三，要强调农民起义的正义性，就非相对地刻画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活动不可……于是，历史上的光明面丧失了，……历史几乎成为漆黑一团，灰溜溜的。”[22]三、强调要用阶级分析方法评价历史人物。他说：“要注意阶级关系，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人物，但是不可以绝对化，把阶级成份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唯一尺度。”[23]他认为，如果光拿阶级成份评价历史人物，几乎所有的卓越人物都要被否定，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几乎只有统治阶级子弟才享有文化学习的机会，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等大都出身于地主阶级。同一时期，其他的史学家像侯外庐、吴泽、吴玉章、邓拓等也都着重从历史主义立论，申论自己的意见。在当时，曾经引起了一场“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的争鸣，有的文章着重论述必须坚持阶级观点，有的文章着重阐发必须坚持历史主义，基本上尚属于正常的学术讨论的范围，而且争鸣的双方既有观点不同之处，也有看法相同的地方，如强调坚持历史主义的同志主张“阶级观点应与历史主义相统一”，而强调阶级观点的同志主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本身包含着深刻的历史主义的要求”。《人民日报》对这种学术上的自由讨论予以肯定和提倡。讨论中，不少学者以历史主义为旗帜，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对盛极一时的片面强调阶级观点提出辩驳，竟一时震慑住了“左”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新中国建立后17年史学发展基本方向的正确性，提高了历史研究水平。但是到了1965年，不少文章开始把学术讨论和现实的阶级斗争形势联系起来，把矛头对准翦伯赞、吴晗这些高举历史主义旗帜的“主帅”，历史主义观点受到来势汹汹的政治围攻和批判，灾难正一步步降临到翦伯赞、吴晗这样正直的、勇于坚持真理的学者头上。

1965年戚本禹在康生的支持下，发表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24]一文，借批判中国新文化运动创始人之一的胡适以及历史主义原则，把“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相对立，攻击翦伯赞、吴晗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戚本禹看来，只有研究农民战争史才算是“为革命”用无产阶级观点研究历史，而主张统治阶级人物应占有一定历史地位的史学家则是与时代相背离和不正常的。他所谓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就是历史学必须为眼前政治需要服务的更加穿凿和简单化的说法，即根据某种政治需要来改铸历史，欲将历史学直接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从而把历史学逐入了死胡同。同年底，姚文元又炮制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汇报》1965年11月10日），针对吴晗及其《海瑞罢官》展开批判，其实质是对历史主义原则的全线进攻。虽然斗争之初，在《海瑞罢官》问题上形成了两军对垒的战局，但随着对吴晗政治学术全面批判的逐步扩大、升级，其烈火殃及到翦伯赞等史家。1966年4月《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文章批判吴晗，紧接着登出《翦伯赞同志的反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点》一文。随后《红旗》

杂志发表了戚本禹等人的《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25]和《反共知识分子翦伯赞的真面目》[26]等文章。就这样，在戚本禹的蛊惑、煽动下，“批判以吴晗、翦伯赞为主将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史观”，成为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大批判之名，行罗织罪名、实行残酷的政治迫害之实。翦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和《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两文所论述的“历史主义”原则深深打中了唯恐天下不乱的野心家们的要害，因此被林彪、“四人帮”的爪牙宣布为“反党大毒草”。最后吴晗、翦伯赞相继受迫害而死。原先他们在连续写文章、做报告之时，本人对可能引起的麻烦有所预感，周围友人也曾提醒，但他们置风险于不顾，最终为捍卫唯物史观原则、发展历史评价理论贡献出生命！

[1] 刘大年：《〈历史研究〉的光荣》，《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第593—596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 郭沫若：《关于目前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新建设》1959年第4期。

[3] 范文澜：《反对放空炮》，《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

[4] 《纪念太平天国革命110周年 首都史学界讨论六篇学术报告——范文澜发言说历史研究必须坚持严格的历史主义》，《人民日报》1961年5月31日。

[5]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第66、69页，新知书店，民国三十五年版。

[6] 列宁：《列宁全集》第20卷，第401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7] 翦伯赞：《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光明日报》1959年3月28日。

[8] 翦伯赞：《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红旗》1959年第10期。

[9] 翦伯赞：《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1962年6月号。

[10] 翦伯赞：《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光明日报》1959年3月28日。

[11] 翦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光明日报》1961年12月22日。

[12] 翦伯赞：《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1962年6月号。

[13] 翦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光明日报》1961年12月22日。

[14] 翦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光明日报》1961年12月22日。

[15] 翦伯赞：《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光明日报》1959年3月28日。

[16] 翦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光明日报》1961年12月22日。

[17] 翦伯赞：《关于史与论的结合问题》，《光明日报》1962年2月14日。

[18] 翦伯赞：《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1962年6月号。

[19] 田余庆：《历史主义无罪》，见《翦伯赞纪念文集》，第83页、第79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0] 吴晗：《历史教材和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3卷，第334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1] 吴晗：《历史教材和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3卷，第329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2] 吴晗：《历史教材和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3卷，第329—330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3] 吴晗：《论历史人物评价》，《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3卷，第407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4] 戚本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红旗》，1965年第13期，第14—22页。

[25] 戚本禹 林杰 阎长贵：《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红旗》，1966年第4期，第19—30页。

[26] 戚本禹 林杰 阎长贵：《反共知识分子翦伯赞的真面目》，《红旗》，1966年第15期，第25—35页。

- 上一篇文章： 张启耀：晚清学术文化演进概述
- 下一篇文章： 刘宜庆：刘节：独立精神的坚守者

【发表评论】 【告诉好友】 【打印此文】 【关闭窗口】

最新5篇热点文章	最新5篇推荐文章	相关文章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刘大年逝世10周年追思会在京举...[203] • 恭祝大家新春愉快[183] • 怀念齐克彬同学[162] • 黄征：敦煌学翻天覆地三十年[95] • 《中华古籍总目》编纂拉开序幕...[226]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史学研究网》寄语[595] 	<p>没有相关文章</p>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没有任何评论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站长 | 友情链接 | 管理登录 |

2004-2007版权所有：史学研究网